

革命與暗殺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暴力的初步考察

陳佑慎

摘要

運用軍隊、聯絡會黨、執行暗殺，都曾經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主要暴力工具。但吸引同時代人目光的暗殺事件，卻鮮少成為後世史學家的研究焦點。近代中國頻繁的政治暗殺事件，以晚清革命黨人的活動首開序幕，其間黨人更曾挪用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話語進行宣傳。然而，清廷覆滅，民國肇建，中國仍無法告別革命。假「革命」之名行使的政治暗殺，遂層出不窮，也常淪為革命者內鬥的工具。因此，本文試圖挑戰革命史觀對政治暗殺事件的敘述，指出宣傳文本上的修辭，和行使暗殺時所考量的策略，不盡可混為一談；並強調討論相關問題時，至少有兩個不同卻又攸關的層面。就政治暴力現象而言，頻繁的政治暗殺事件萌發於晚清，迄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傾覆前夕而未絕。但就「革命話語」而論，革命黨人倡說暗殺、討論暗殺，直到1920年代才因主流革命理論的改變，遂在口頭上將之揚棄。綜合觀之，它既是與政治脫序攸關，也曲折地反映出中國社會對政治「現代」的想像，相關政治暴力的課題，仍值得學界作更細緻的考察。

關鍵詞：暗殺、無政府主義、革命話語、政治暴力。

Revolution and Assassina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Yu-shen Chen^{*}

Abstract

Mobilizing armed forces, collaborating with secret societies, and attempting to assassinate were once the main violent maneuvers in Chinese revolutions. However, assassinations, which often drew much attention during their time, were rarely discussed by later scholars. Modern China's rampant cases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were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revolutionists in the Late-Qing period.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 discourse of "anarchism" for the purpose of propaganda. Even after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an China, revolution never stopped. Many attempts of assassination were done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 and were also used as a tool for internal strives.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challenge discussions o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as found in many studies done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volution and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course of propaganda and of actual strategies used in attempting assassinations. This article would point out that in dealing with this topic there are two levels involved. The first level concerns political violence: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germinated in the Late-Qing period and had never stopped even on the ev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Nanjing Kuomintang regime. The second level concerns the discourse used by the revolutionists; they advocated assassinations and discussed assassinations until the 1920s when they finally agreed to forsake such practices. In short,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were not only linked with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olitical discord,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oncept of modern politics in the eyes of Chinese revolutionists . Issues about political violence deserve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assassination, anarchism,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political violence.

國史館館刊 第25期

革命與暗殺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暴力的初步考察^{*}

陳佑慎^{**}

一、前言

1919年夏天，五四運動的餘波猶在蕩漾，蟄居上海環龍路，一度對時局暫時消極觀望的孫中山，此時乃興致勃勃地注目「民氣大張」、「國民智識大有進步」之景象。孫極言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賴「思想」上的變化，即所謂「攻心」或「革心」之途。¹不過，顯然不是所有黨同志都執著於這樣的「革心」工作。7月1日，一位名叫王鼎的黨人上書於孫，略稱擬組織「暗殺團」，請速援助並派人指示。孫似乎不願親自回應這一請求，該書函上僅僅留下了如下批語：

代答以暗殺一事，先生向不贊成。則在滿清時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惡人殺不勝殺也！道在我有巨大之主義積極進行，則惡人自然消滅，不待於暗殺也。²

未幾，孫於10月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放寬若干祕密會黨式的嚴格規定，以便吸引青年知識分子參加。由此看來，革命黨將由游俠色彩濃厚的團體，澈底搖身變為更具社會基礎的群眾政黨。實則不全然如此，且孫對「暗殺」的態度，也遠較前揭文字表面所呈現者更為複雜。

*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師長及學友惠賜寶貴意見，至為銘感；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斧正，筆者尤感受益，謹致謝忱，已盡量在修訂中採用，惟仍有若干問題仍待更細緻的處理。

收稿日期：2009年12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5月27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 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22-31。

2 〈王鼎上總理函〉，1919年7月1日，原藏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環09285。本文所用「環龍路」檔案，採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數位複本。

至少，孫中山是否如他所聲稱的，總是阻止同志行使暗殺，便有疑義。惟孫對暗殺的真實態度姑置不論，前揭引文倒已影射出耐人尋味的訊息，亦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是一個暗殺事件頻仍、政治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的社會。晚清革命黨人吳樾，³手著之《暗殺時代》，嘗和鄒容《革命軍》，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歐榘甲《新廣東》等著作，並列為反清革命的重要宣傳文本。吳竭力嘶喊：「今日為我同志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為我漢族之革命時代」，⁴雖未完全契合他身後的歷史發展，卻一語成讖地預示中國即將走入「暗殺時代」。

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⁵於其回憶錄內也有一個隱喻，謂在1920年代以前，亦即革命者還不強調「群眾運動」的年代，革命運動的實踐不外乎經由「運動軍隊、聯絡會黨、用手槍炸彈對付」⁶三法。所謂「用手槍炸彈對付」，便是政治暗殺。這顯示了革命、暴力與暗殺之間，常帶有曖昧難解的關係。不過，這一類吸引同時代人目光的事件，卻鮮少成為後世學者的研究焦點。畢竟暗殺活動往往帶有祕密性質，無可避免地成為研究上的窒礙。但即便如此，報刊所載篇幅浩繁的相關文字，實乃探討政治文化氛圍的重要材料，⁷仍舊沒有吸引到足夠的注意。

3 吳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投身反清革命後，曾加入「北方暗殺團」，並經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1905年刺殺清廷五大臣失敗後，身亡。但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將他的遺書悉數發表，追認為會員。

4 吳樾，《暗殺時代》，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頁217。

5 張國燾（1887-1979），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萍鄉上饒人。早年入北京大學，積極參與五四運動，乃重要學生領袖之一。後為中國共產黨創黨黨員、早期領導人之一。1935年，紅軍「長征」期間，與毛澤東等人爆發衝突，幾釀成分裂危機。1938年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同年被開除中共黨籍。

6 張國燾似乎以這樣的隱喻，鋪陳1924年改組前的國民黨人之「舊」，對照五四青年共產黨人之「新」。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1年），頁35。

7 如1963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案，便刺激了西方學者對政治暗殺的關心。特別是新聞媒體在報導中，不但組織新形態紀念儀式，重現不同版本的歷史事件，更重構了社會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電視作為新的傳播媒體，更使觀眾深感「歷史如實呈現」，進而對社會造成難以言喻的衝擊。參見Murray Edelman; Rita James Simon,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s: Their Meaning and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Ethics*, Vol. 79 No. 3. (Apr., 1969), pp. 199-221. Kurt W. Back; Judith Saravay, "From Bright Ideas to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1 No. 2. (Summer, 1967), pp. 253-264; Barbie Zelizer, *Covering*

林郁沁（Eugenia Lean）在其2007年出版的專著中，以1935年的施劍翹⁸刺殺孫傳芳案為主軸，精彩地鋪陳有關案主形象、道德想像、傳媒報導、法律審判、性別政治，以及國家建構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拉扯與張力等面向。⁹不過，施案在不同的時地雖被賦予不同的政治想像，本質上究非「政治暗殺」。正如林著中提及的，施劍翹與國民黨攸關的俠義形象，在日後中共統治下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箭靶；為此，施乃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利用革命的修辭隱匿這段過去。然而，國民黨本身源遠流長的刺客俠義修辭，學界迄今未見令人滿意的討論。作為政治暴力現象，暗殺風潮在晚清的興起、宣傳、討論，乃至於1920、30年代以後的流變，是本文著意的議題。

學界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暗殺風潮的理解固少，卻已夾雜了太多的主觀褒貶臧否，甚或剝離當日的歷史情境。正如在1912年9月11日，亦即中華民國肇造之際，革命黨人便將一年前刺袁未成，遭到捕殺的張先培、黃芝萌、楊禹昌三人遺骨，與炸良弼而身殉的彭家珍合葬，題為「四烈士墓」，供後人瞻仰。¹⁰自此，革命史觀已成討論相關問題時揮之不散的幽靈，而暗殺行動既被敘述為晚清革命黨人「鐵血之壯舉」；反之，黨人如宋教仁、陳其美的遇刺身亡，則反映了革命受挫、志士犧牲的事蹟。¹¹另一類看法雖稍帶貶意，同樣不脫革命史觀的束縛。如在若干中國大陸馬克斯主義史學裡，晚清暗殺風潮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本著「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行為，既不能保證革命的成功，也不能撼動反動政權的根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8 施劍翹（1905-1979），原籍安徽桐城，自小生長在山東濟南。父親施從濱任山東軍務幫辦兼奉系第二軍軍長，1925年直奉戰爭期間遭孫傳芳所殺。1935年，施劍翹在天津刺殺已下野的孫傳芳，引發輿論關注。1936年，施獲特赦出獄。
- 9 參見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感謝陳建守提示本書重點。
- 10 賈忠勻，〈北京暗殺團刺袁紀實〉，《文史天地》，1996年第3期，頁38。
- 11 參見張其昀，《黨史概要（近六十年中國革命史）》，第1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頁92；李守孔編著，《國民革命史》（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年），頁112。

基。¹²但耐人尋味的是，以上兩種看法共同之處在於：第一，聚焦於晚清的暗殺風潮，疏於討論民國肇建後的情況；第二，相信晚清暗殺風潮乃出於「革命」，視辛亥年後的政治暗殺，「不再打著革命的幌子」。¹³

究其實際，辛亥年以後的政治暗殺事件，絕非「不再打著革命的幌子」。革命黨人執行暗殺、倡說暗殺、討論暗殺，歷十數年而不絕，迄1920年代才稍抑其焰。而這一革命話語系統的改變軌跡，確屬值得探究的議題。同時，國共兩革命政黨因革命話語的轉變，不得不在口頭上（僅僅是口頭上）揚棄暗殺後，中國猶是一個政治暴力現象層出不窮的社會。這似乎顯示，晚清暗殺風潮的幡然崛起，以及暗殺事件在民國時代仍舊無從絕跡，既是導因於中國政治的激進化，也植根於政治軌道的脫序。暗殺是革命運動中常見的流血，摒棄暗殺手法並不代表革命運動會揮別暴力。

無可諱言地，本文僅聚焦在自詡「出於革命」的政治暗殺者流，而非各類事例的總體檢。諸案背景相異，影響不一，未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仍宜進行適度的微觀分析。以目前的研究條件，本文在晚清部分比重稍大，再兼論及1920年代前後的发展。後者既非中國「暗殺時代」的高峰，也非其終點。惟正是在此時，若干知識分子對清末暗殺潮作了反思，應有一定的關鍵歷史意義。而筆者對相關趨勢所作的

-
- 12 見黃佳，〈無政府主義的傳入與辛亥革命時期的暗殺風潮〉，《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4:2（2002年6月）；白純，〈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活動探析〉，《學海》（2001年3月）；歐陽恩良，〈資產階級各派別與辛亥前夕的暗殺思潮〉，《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3:6（2001年）；〈辛亥暗殺風雲的思想社會根源〉，《青海社會科學》，2（2002年）；牛貫傑，〈試論清末革命黨人政治暗殺活動的文化根源〉，《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2002年）。
- 13 見Henry Y. S. Chan, *Terrorism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00-1911*, Ph.D.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又如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對軍統特務的研究，應算是反映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政治暗殺事件的理解，但同樣論斷辛亥革命以後的政治暗殺「不再打著革命的幌子」。惟這類武斷的看法，至少無法解釋革命黨人在討袁（世凱）時期的一系列暗殺活動。見氏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祕勤組織》（*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頁367之討論。而即使是較晚近的研究，亦為如此，見吳潤凱，〈復仇與革命—清末「暗殺潮」透析〉，《二十一世紀》，總第98期（2006年12月）。另外，部分學者討論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活動，但並未處理晚清歷史遺緒的問題。見劉熙明，〈看不見的血手：國共內戰時期的國府特務人員殺人與蔣介石之關係〉，《臺灣史學雜誌》，第6期（2009年9月），頁126-151。

概念性討論，無非是跳脫「革命」史觀，理解「革命」與暗殺的嘗試。謹盼這一粗淺的鋪陳，能另闢理解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蹊徑。

二、「暗殺時代」的降臨

李寶嘉作於1903年至1905年間的小說，《文明小史》，曾刻劃有人企圖運用暗殺手段，刺「借外兵以平內亂」的前雲南總督陸夏夫（不知影射何人）。¹⁴在1912年至1914年間問世的《滿清稗史》中，作者陸保璿甚至別立〈暗殺史〉一節，分述成得刺清仁宗案、張汶祥刺馬新貽案，至吳樾炸五大臣案、張先培炸袁世凱案、薛成華炸張懷芝案等十四個暗殺事件。¹⁵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暗殺事件也許已成為晚清社會氛圍的重要記憶。

並非所有的暗殺事件都具政治意涵，自不待言。正如前揭的1870年張汶祥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曾經喧騰一時，也是後世稗官小說家汲取靈感的泉源，但不論在事發之際，抑或在日後的再現當中，都沒有被賦予鮮明的政治符號意義。本文對「政治暗殺」的界定，是指在常規性的政治參與（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之軌跡外，以異於正規軍事衝突或儀式性暴力的方式，所採行的政治暴力行為。¹⁶暗殺者通常以誅除敵對陣營首腦一、二人為度，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尋求博取公眾的同情；若無這樣的條件，他們仍會在內部維繫一定的政治信念，以達成目的，與前列理想類型符節的事件，要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在中國頻繁地出現。

1899年，兩廣總督德壽出金懸賞革命黨人首級，導致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遇刺身亡。¹⁷但未久之後，若干革命黨人為了和同志的武裝起事遙作桴鼓之應，也開

14 參見李寶嘉，《文明小史》（臺北：世界書局，1981年），〈第三十七回・出警署滿腔熱血 入洋教一線生機〉。

15 陸保璿輯，《滿清稗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頁1213-1268。

16 借用政治學概念。參見G. A. Kourvetaris, B. A. Dobratz, "Political Power and 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8 (August 1982), pp. 289-317.常規性的政治參與模式，一般以選舉、投票、集會遊行等為主；反之，非常規性模式則可以暴力、暗殺、軍事衝突為例。

17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6。

始頻繁地使用暗殺手段。1900年，鄭士良在惠州一帶聯絡會黨，圖謀舉事；同時，史堅如則謀在廣州省城炸粵督德壽以資響應，惟事敗被捕，備受刑杖，卒被定斬首之刑。¹⁸史氏之受戮，並未遏止暗殺風潮的蔓延。史本人猶未使用華麗的辭藻，來大倡暗殺手段，惟在他身後未及三、五年光景，中國不獨暗殺事件疊出，甚至還出現了難計其數的宣傳文本。

較早採文本形式宣揚暗殺手段，試圖以之「喚醒」國人者，首推1903年在日本出版的楊守仁¹⁹《新湖南》。楊氏受日譯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文本的影響，大倡以「破壞」來「改造社會」，而「破壞精神最強盛者，莫如俄國之無政府黨」。我們稍後再討論，晚清革命黨人如何挪用（appropriation）無政府主義話語，來型塑新世紀的游俠刺客。在此之際，僅先留意楊氏所盛讚的，俄國黨人由遊說煽動，昇華到「暗殺恐怖時期」，遂駸駸乎宣告皇帝之死刑。²⁰隔年，即發生萬福華在上海租界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的事件。黨人聞之，一面大感振奮，²¹一面又向租界當局聲言暗殺對法令雖「稍有違犯」，但治「國事犯」之法究非「匪黨」之法可資相比。²²

常規政治參與之途既然不通，政治暴力似乎就在所難免。黨人不以「恐怖」為忤，當本此意。²³惟清廷有鑒於時風所趨，勢難阻擋，也亟思政治改革之道，遂有1905年前後的籌備立憲之舉，不意這仍引發了激進主義的更強烈反撲。黨人吳樾見「改革」恐將壓縮「革命」空間，正感憂心如焚之際，讀到萬福華案的相關文

18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輯（臺北：世界書局，1954年），頁108。

19 楊守仁（1872-1911），原名楊毓麟，字篤生，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並加入同盟會。1911年黃花崗起事失敗後，在英國利物浦跳海自殺，著有《新湖南》等書文。

20 楊守仁，《新湖南》，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頁93-98。

21 〈書萬福華行刺事〉，《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7日。

22 〈有一為此將為戮乎？〉，《警鐘日報》，1904年12月6日。

23 例見匪石，〈野獲一席話〉，《浙江潮》，3，1903年3月20日，頁10，謂：「能製造虛無黨者」，「必曰地球上警察軍備最完全之專制國家」。獨頭，〈俄人要求立憲之鐵血主義〉，《浙江潮》，第4號（1903年4月20日），頁6-11，亦謂：「民意者，法之根本也。政府既不能應平和之懇請，則吾人不得不施強暴之手段以強制之」，「非好為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例」。

字，乃為之精神勃發，頗躍躍欲試。²⁴1906年，吳隻身往赴上海車站，謀炸清廷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彈未及擲，不慎引爆，慘死現場。不過，他生前所遺下的數篇文章，很快地成為革命黨人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奉獻的象徵。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便在第三號（1906年）發表吳樾的〈意見書〉，以及「炸清廷五大臣者吳樾烈士」肖像圖版。²⁵次年的第十二號，更增刊「天討」，²⁶大幅刊載吳樾所作遺書。後者即是著名的《暗殺時代》，和鄒容《革命軍》，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歐榘甲《新廣東》等書文並列為反清革命的重要宣傳文本。

「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²⁷是吳樾為「暗殺時代」所留下的註腳。這其實是說，革命黨人想以激進爆裂之手段，在有如一灘死水的中國社會裡激起漣漪。當同盟會於鎮南關、河口之役面臨挫敗，黨人終日抑鬱，信心全失，備感時局艱難。與黃興、章太炎同居的湯公介，乃益加傾慕俄國革命事業，於《民報》上撰〈崇俠篇〉、〈革命之心理〉等文，大倡暗殺急務，欲以吳樾故事激勵同志。未料〈革命之心理〉一文，落入破壞治安之口實，清廷遂促請日本政府將《民報》社封禁。²⁸民報社之封禁案，未始不可視為清政府有意抑制暗殺風潮的蔓延，但顯然是徒勞無功的。反之，在黨人正面衝突不順遂的情況下，往往促使更多熱血青年投身其間，這可由「支那暗殺團」的設置為例。爰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²⁹謀炸粵水師提督李準，事敗被捕。兩年後（1909年）為黨人營救所釋，潛於香港。1910年，適逢廣州新軍之役失敗，大量黨人湧入香港避居。眾復聞汪精衛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事敗，愈感激憤，乃籌組暗殺團欲繼踵其後。同年，受到溫生才槍擊署廣州將軍孚琦以及三二九之役失敗兩事的刺激，團員遂決心暗殺

24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輯，頁197。

25 《民報》，第3號，1906年4月5日。

26 《民報》，第12號，1907年3月6日。

27 吳樾，《暗殺時代》，頁215。

28 曼華，〈同盟會時代民報本末記〉，《革命文獻》，第3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3年），頁223-224。

29 劉師復（1884-1915），原名紹彬，字子麟，學名紹元，廣東香山縣人。近代中國重要無政府主義者，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未果，1910年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1915年病逝於上海，著有《師復文存》、《伏虎集》等書。

粵省大吏張鳴岐、李準，以重振士氣。事雖失敗，但到了1911年，竟成功地炸斃繼任的廣州將軍鳳山。³⁰近於同時，黃興也因三二九之役失敗，痛青年同志的折損、華僑捐款的虛擲，憤而準備投身暗殺行動，自謂如此方可「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³¹換言之，與單純出於配合武裝起事的史堅如案不同，同盟會時期的暗殺恐怖手段，更強調的是「喚醒」國人、作勵黨同志士氣。

晚清的社會公眾輿論，如何看待這類事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不過，這種以一人敵一帝國的姿態，確實容易帶有慷慨燕歌市的悲壯色彩。流風所及，即使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亦難置身於外。據傳，1900年間，梁曾函澳門《知新報》同人及唐才常、康有為等，商討暗殺李鴻章事。³²而梁氏在力持「革命萬不可行」之餘，仍舊不無矛盾地承認：「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³³

毋庸置疑地，前述所舉暗殺事件，僅只一隅，為人所津津樂道者，還有1907年徐錫麟刺皖撫恩銘³⁴等案。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暗殺風潮，就在人為的推波助瀾下，四處蔓延遍布全國，不獨發生在京津中樞或者商邑名城上海，即如邊鄙的雲南也有1906年楊振鴻謀刺雲貴總督丁振鐸案。³⁵甚至在海外，清吏亦未必得以倖免，1910年，便發生了鄭佐治在美國舊金山謀刺清海軍大臣載洵案。³⁶據估計，自1900年史堅如案起，至1912年彭家珍炸宗社黨員良弼止，暗殺事件爆發不下五十餘次，年年有暗殺事件，黨人先後籌組16個暗殺團。³⁷惟作為中國政治脫序的產物，暗殺風潮並未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銷聲匿跡。蔣夢麟回憶，民初國會議員名聲甚為狼藉，曾有北京學生憤而謀炸議會。事為蔣氏勸阻，並將炸彈拋棄城外。數星期之後，不慎

30 李熙斌，〈記同盟會中之一個暗殺團〉，《革命文獻》，第66輯，頁29-35。

3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輯，頁343-349。

32 郭廷以編，〈近現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頁1066，1900年3月28日條。

33 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飲冰室文集》，第5輯（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頁127。

34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輯，頁81-90。

35 張大義，〈同盟會雲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動〉，《革命文獻》，第66輯，頁56。

3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輯，頁281-282。

37 詳見嚴昌洪，〈辛亥革命的暗殺活動及評價〉，湖北歷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引爆，誤斃漁人一名。耐人尋味的是，北京警方竟認為炸彈是革命時期的遺留物，根本沒有進行任何調查。³⁸這段故事顯示，暗殺既被視為「革命時期」的尋常之物，也沒有隨著民國肇造走入歷史。

前揭此起彼落的暗殺事件，很容易被敘述成大無畏的革命英雄史詩。然而，在華麗的修辭背後，這類事件不免仍是政治暴力文化的反映。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或難視作吳樾炸五大臣案的續曲；但稍早蔣介石於1912年初刺殺同為革命派人物的光復會領袖，³⁹就似乎是晚清革命黨人暗殺風潮的變調了。陶成章本是1907年春同盟會內部反孫中山風潮的肇始者，復於1910年2月在東京「重建」光復會，擁章太炎為會長，正式與同盟會分家。辛亥革命既起，兩方人馬更為了爭奪江浙等地的政權鬧得不可開交。及至刺陶案事發，輿論為之大譁，蔣乃不得不走避日本，另一兇手王祝卿則被光復會員雇人所斃。即便如此，章太炎仍舊盛怒難消，斥陳其美與黃興為「二豎之朋比為奸」，⁴⁰頗感髮上衝冠！這顯示了革命與暗殺間的關係，不若吳樾所預想的具有因果邏輯，反而呈現曖昧的伴生現象。「革命」可以用浪漫化的語彙再現，但也可從中發現暴力、任意與專斷。在面臨政治符號詮釋權的爭奪，或是政治權力的競逐時，革命者之間難免也會「互相革彼此的命」。⁴¹陶成章案的發生，豈非前述現象的極佳寫照？

惟毋庸置疑地，反清革命確為「暗殺時代」的敲門磚，但「暗殺時代」並未與反清革命相終始。既然如此，這樣為期不算短的歷史現象，其背後所依恃的文化脈絡，自屬耐人尋味的課題。

38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社，1959年），頁145。

39 近來，透過《蔣介石日記》等史料的運用，學界已知暗殺陶成章的兇手確為蔣介石。參見楊天石，〈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40 轉引自楊天石，〈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頁98。

41 黃金麟曾以「清黨」為例，討論革命帶有的暴力、任意與專斷，是國內學界較早討論及此的論著。參見氏著，〈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11：1（2000年）。又如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輿論大嘩，《晨報》社論便批評「國民黨以反革命三字誅戮異己，箝制言論久矣」，參見〈社論：反革命與偽革命〉，《晨報》，1928年3月7日。不知以上所言，作者是否有將晚清的政治文化氛圍，一併列入考慮？

三、虛無黨加游俠刺客

1913年5月，宋教仁遇刺案的餘燼尚可嗅聞，天津《大公報》刊登了一篇駭人且費解的「暗殺介紹所章程」，略稱：

荊軻擊秦，秦皇繞柱；子房奮椎，誤中副車。一則被殺，一則幾死而免。本主人每覽及此，未嘗不掩卷長歎！古人暗殺之術不精，徒取天下之笑也。今中國文明暗殺之事，層見迭出，暗殺之械，亦精利無倫，如宋教仁等一擊即中。然刺宋者卒以機關不密而敗，身戮財喪，為天下笑，美猶有憾焉。本主人有鑒於斯，特募鉅資，設「暗殺介紹所」，遴才必精，用械必良，誠暗殺中之革嚴界也。⁴²

正如前揭文字所鋪陳的，荊軻擊秦、子房奮椎，皆出於中國典故。這顯示了即使在文本的世界裡，暗殺本非中國人所陌生。張良故事，後人談起，每多奕奕生風；司馬遷更在《史記》別置〈刺客列傳〉，紹述荊軻聶政；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引述贊上，也津津樂道這群刺客曾使「暴秦奪魄，懦夫增氣」。然而，世人遙想的俠士情懷，常只能寄於史遷筆下的渺古意象——雖然流傳深遠，實是絕響，《漢書》以降，不復有膾炙人口的〈刺客列傳〉。況乎同在漢代，亦有王符《潛夫論》筆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的職業刺客「會任之家」。後者帶有的負面形象，在相當程度上亦屬中國社會對刺客的看法。換言之，荊軻聶政故事，常只作模糊的意象；在現實世界中，暗殺事件依舊不足為人所道。不過，本文不擬繼續探討傳統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面貌多變的任俠精神，在此仍先回到吳樾等革命黨人身上。

「自秦漢降，吾族不武，荊軻聶政之事，幾於絕跡」，⁴³是同盟會刊物《民報》在吳樾身亡後，所作的歷史詮釋。早期革命形勢的不順遂，確使眾多革命黨人將之歸咎於「俠士充物之古國，乃變為行尸走肉之大陸」。⁴⁴所謂震旦之亡，非亡

42 〈暗殺介紹所章程〉，《大公報》，天津，1913年5月23日。

43 〈烈士吳樾意見書〉，《民報》，第3號，1906年4月5日，「本社記者按」。

44 佚名，〈論萬福華事〉，《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5日。

於齊民，而亡於士大夫；不亡於無才智，而亡於無氣節。⁴⁵藉由鼓動暗殺風潮，黨人或可宣洩悲憤之心，或能冀望「喚醒同胞」，進而為禹域重振國民精神。

這並不是說，晚清革命黨人是傳統任俠的重出江湖，吳樾的《暗殺時代》是荊軻擊秦故事的重新詮釋。本質上，革命黨人重提俠士語彙，是一種挪用，且帶有某種「現代」的自覺。梁啟超嘗別有洞見地指出，觀數年以來，「言暗殺者」其實就是倡政治、教育、實業改革之人，是爭路權、爭礦權之人，是編教科書、任教授之人，是投身革命之人。⁴⁶他們普遍相信，古代俠士多為個人，無關社會，荊軻亦僅僅「出於燕丹一人之恩仇」；至於以討伐「國民公敵」為標的，進行暗殺活動的作法，則屬世界文明近二百年來的「創見」。⁴⁷正如黨人汪旭出所言，古代將帥秉承君意，榮以節鉞，受命馳驅；古代伍卒，則惟大將旗鼓是從；獨「今之刺客」不然，後者所敵者皆名卿大官。⁴⁸汪又形容，昔張汶祥刺馬新貽，事雖慷慨，使人泣下，仍僅出於友仇；直至晚近，因「時俗趨向，競效歐美」，方有「吳樾為世家子，廁列僕隸」的暗殺事件。⁴⁹

所謂「時俗趨向，競效歐美」，指的自是十九世紀末葉以降，一度風靡中國知識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這裡應強調，無政府主義反對國家、教會等權威機構，相信人類之間具有的互助合作性格；這與反對一切、不避諱盲目使用暴力的虛無主義（nihilism），本有一定的區別。然而，原本不尋求恐怖手段的歐洲無政府主義者，在1880年代後，受到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刺激，以及政府對反對運動採取高壓手段等影響，乃開始採取傳統的社會抗爭形式，包括「正義的」弑君。⁵⁰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家幸德秋水（1871-1911），著於1902年的《長舌》，遂謂暗殺是腐敗社會之必然產物，無政府主義亦是國家社會的絕望產物，譯本頗引中國讀者的

45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報》，第24號，1908年10月10日。

46 梁啟超，〈論政治能力〉，《新民說》（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頁156-157。

47 佚名，〈外論：書萬福華行刺事〉，《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7日。

48 寄生，〈刺客較軍人論〉，《民報》，第16號，1907年9月25日。

49 寄生，〈安撫恩銘被刺事件〉，《民報》，第16號，1907年9月25日。

50 參閱Richard Bach Jensen, "Daggers, Rifles and Dynamite: Anarchist Terror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ume 16 Number 1 (Spring 2004), pp. 116-153.

矚目。⁵¹1905年後，幸德秋水復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影響，鮮明地反對議會政治和公民普選路線，主張以罷工和暗殺來建立道德烏托邦社會。在他直接的影響下，以劉師培⁵²等人為首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團體「天義派」迅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案例。⁵³於是，眾多中國知識分子便在前揭各種思潮激盪下，日趨走向激進化的道路。惟他們也像其他國家的人士一樣，常將「無政府主義」與「虛無黨」混為一談，兩者在中國幾乎成為同義詞。⁵⁴

在晚清文學界，有所謂「虛無黨小說」熱潮。而《孽海花》等文本對虛無黨素材的成功徵用，刻劃暗殺情節，可以窺見政治思潮向文學滲透的軌跡。⁵⁵在現實政治上，「暗殺」亦成了「無政府主義」對革命黨人的啟發。早年的無政府主義「世界社」派人物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等，均認同暗殺主義。⁵⁶其機關刊物《新世紀》，自第32期始，每期均報導世界各地暗殺事件的消息。即使是美國總統林肯遇刺或黑手黨的火拼，也豔稱為無政府主義壯舉。1903年至1904年間，革命派報刊如《蘇報》、《江蘇》、《浙江潮》、《女子世界》、《中國白話報》等，均大量刊載有關暗殺、俄國「虛無黨」的文章。以1904年的《中國白話報》為例，就先後發表劉師培（署名「激烈派第一人」）〈論激烈的好處〉、林獬（署名「白話道

51 余杰，〈不徹底的「虛無」——從晚清小說「女偵探」談起〉，《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4期（上），頁20。

52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龢，江蘇儀征人。自幼習《周易》、四書五經。1904年起，參與革命派刊物《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國粹學報》編輯工作，積極為《中國白話報》撰稿。曾加入中國教育學會、光復會、同盟會、國學保存會等組織。1907年起，發起「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民國成立後，與楊度、嚴復等發起「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晚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古文學、「三禮」、《尚書》、訓詁學等。

53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236-238。

54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頁76-87。

55 參見張全之，〈從虛無黨小說的譯介與創作看無政府主義對晚清小說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3期，頁138-149。

56 無政府主義本不強調激進暴力，但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將之與「虛無主義」混為一談，才會既出現蔡元培等人在晚清以「無政府主義者」立場支持暗殺，又出現1919年毛澤東根據無政府主義駁斥「炸彈革命」、「有血革命」。這一情況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修訂版），頁79-80。

人」)〈國民意見書：論刺客的教育〉兩文。1907至1908年間，《民報》、《漢幟》、《中國新女界雜誌》、《河南》、《新世紀》、《天義》等刊物，也多雜採相關話語，連篇刊載鼓動暗殺的思想。⁵⁷

不過，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外的因素，仍然必須留意。就技術條件論，拜器械、彈藥技術成熟之賜，即使是過去被視作文弱書生的知識分子，也可能僅憑胸中的一股滿腔熱血，毅然投身暗殺行動。以前揭的楊守仁為例，就為了掌握暗殺器械的使用，如飢似渴地研習化學。⁵⁸無可諱言地，吳樾一類的「世家子」更常因操作不慎，或走火引爆，或彈擊未準，導致事洩被捕、慘死現場。惟這群「烈士」的政治意念，自有其身後的同志續加宣揚。且因鉛印、石印技術的發達，晚清的新式報刊流通已十分廣泛。當局對政治意味濃厚的新式報刊，雖抱持禁絕態度，卻無法澈底封鎖各類宣傳文字從海外、租界回流中國。面對春雷乍起的新式傳媒，清政府仍是一個缺乏控制輿論能力的政體，⁵⁹藉由各種書冊的推波助瀾，黨人確實成功塑造慷慨悲歌燕市的壯烈形象。1910年，清政府破獲汪精衛刺攝政王案後，竟以汪等人供詞足以動搖人心，特禁止各報轉載。及至辛亥革命軍興，清廷又將汪從輕發落，未判死刑。⁶⁰汪案的起伏，固可視為當局有意和緩人心、羈縻黨人，但未始不是得利於宣傳之效。⁶¹

自然，不是所有的刺客皆和汪精衛、吳樾同屬「世家子」。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溫生才，出身貧苦，舉事前的職業是馬來西亞的錫礦場勞工。⁶²前揭「支那暗殺團」的團員林冠慈，本是廣東歸善縣鄉人，務農為業。林曾見催收糧稅的吏役，甚

57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頁198-203。

58 李日，〈楊毓麟與近代暗殺活動〉，《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1：5（2002年），頁79。

59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297-337。

60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2輯，頁246。

61 1911年，清遺臣輯有《辛亥殉難記》，所列「殉難」諸臣，不少係為黨人所暗殺。王先謙（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在書中序文嘗嘆：「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雖不專指刺客，實已道出清廷對黨人滿佈之景，既感無力且無奈。參見吳慶坻修、金梁增訂，《辛亥殉難記》（臺北：成文書局，1970年影印本），〈序〉，頁13。

62 參見《溫生才行刺始末記》（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頁277-286。

感不平，後來聽說有「俄國虛無黨用炸彈炸死官吏的故事」，頗也躍躍欲試。林以為西洋人都懂得製造炸彈，某天見到下鄉的基督教牧師，以為「他們就是虛無黨的善人」，竟向牧師求教製彈之法，而遭訓斥一番。林雖遇挫折，仍不斷找尋加入革命黨的門路。1911年8月13日，林終以刺客的身分，在暗殺粵水師提督李準的行動中失去了二十八歲的生命。⁶³1930年代前後傳奇一時的「暗殺大王」王亞樵，⁶⁴江湖氣味濃厚，早歲亦是同盟會會員，據說也「信仰無政府主義」。⁶⁵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刺客，是否真屬「無政府主義者」，已非問題的核心。事實上，不論他們對「無政府主義」、「虛無黨」的理解為何，革命黨人已經挪用了前者的「暗殺」術語，重新建構出屬於中國的革命語彙。

惟就政治思潮言，無政府主義者僅是革命派人物眾多支流的一部，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趨向更非無政府主義風潮可以概括。即以同盟會時期的孫中山為例，他一再強調若不未雨綢繆考慮「民生主義」，則歐美雖強，仍無法免於「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再爆發「第二次之革命」。⁶⁶換言之，孫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將之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絕非現階段中國革命所嚮往的目標（事實上，似乎還是當避免的目標）。再者，黨人更不乏明確反對無政府主義思潮者。1906年，葉夏聲（署名「夢蝶生」）發表〈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竟聲稱將革命黨等同於無政府主義，是保皇黨詆毀革命黨的惑人伎倆，論革命黨與無政府黨不同，則「無政府主義之革命以爆裂彈為之，而政治革命則人民對於政府為公然之戰爭也」。⁶⁷有鑒於同盟會會員的起事行動，每每採用爆裂彈行暗殺手段，葉夏聲所言並不肯切。不過，這或許可以說明革命黨人對暗殺手段的工具性態度。

63 鄒魯，〈林冠慈事略〉，《紅花岡四烈士傳》（臺北：陳雄印行，1959年），頁1。

64 王亞樵（1887-1936），安徽合肥人。早年參加同盟會，後亡命上海，在上海組織安徽同鄉會，並以此為基礎，涉入上海幫派競逐。曾策劃暗殺淞滬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宋子文、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亦曾與朝鮮志士尹奉吉合作，於1932年炸日本在上海之天皇誕辰慶典會場，斃日本駐滬居民團行政委員長河貞次、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傷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1933年參與「閩變」，事敗。1936年，在廣西梧州遭軍統特務暗殺。

65 麥朝樞，〈軍統刺殺王亞樵經過〉，文聞編，《我所知道的政治暗殺秘聞》（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頁81。

66 孫文，〈發刊詞〉，《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頁10。

67 夢蝶生，〈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民報》，第7號，1906年9月5日。

質言之，無政府主義理念並非清末暗殺風潮的真正基礎，前者具體的作用在於提供一套暗殺宣傳文本的修辭形式，並型塑一個浪漫化的奉獻犧牲精神。暗殺活動既未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流行相終始，刺客更沒有侷限在無政府主義信徒之內。正如史堅如之謀炸粵督德壽，不待無政府主義的啟發。即以吳樾的《暗殺時代》為例，表面雖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⁶⁸觀全書大意，揭櫫的仍是國族主義。吳樾追尋的，是推翻異族政府，恢復大漢江山，為達此一目標，勢必要實行「鐵血強權」；欲行「鐵血強權」，則得靠「破壞主義」和「激烈手段」。⁶⁹也就是說，許多革命黨人雖不似梁啟超輩明白宣示的，欽佩虛無黨之「手段」、不贊成虛無黨之「主義」，但革命黨人重視的仍是將暗殺作為「手段」，從旁推進「政治革命」。於是，一般革命派人士為了激盪反滿情緒，在宣傳刊物羅列各種話語時，對無政府主義信徒大倡「暗殺」、「破壞」的論述，自是青睞有加。他們對革命的理解，是政府既然不能「應平和之懇請」，則惟有「施強暴之手段」以反制；欲施強暴手段，又端賴新的英雄主義成形。

與新英雄主義相伴生的現象，是黨人的矛頭指向清帝國親貴，不懼權威。早年興中會苦於缺乏宣傳文字，一度僅憑《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聊備一格，強調的是清政權之「暴恣」。⁷⁰及至二十世紀，革命陣營有了流傳甚廣的鄒容《革命軍》等書冊，可資運用，而鄒容急切又富感染力的文字，已毫不含糊地揭櫫以暴制暴。⁷¹只不過如何具體地行使政治暴力，還有待黨人的進一步發揮。值此時際，北方吹來的無政府主義之風，恰恰給了革命黨人競效歐美的靈感。1908年，一位署名无首的黨人，在〈帝王暗殺之時代〉一文中撰述道，自「天演學說」問世，世人始知百姓和君主均自「始祖鳥進化」；及至「帝王暗殺時代」降臨，世人既然不認帝王為天然產物，不認權力命令為固有名詞，則縱令釋迦基督為皇帝、孔丘墨翟為大統領，刺客的爆裂彈仍將彈無

68 吳樾，《暗殺時代》，頁217。宣稱：「十九世紀下半期，為虛無黨之暗殺時代，二十世紀上半期，則為虛無黨之革命時代」。

69 吳樾，《暗殺時代》，頁228。

70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輯，頁17。

71 鄒容，《革命軍》，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頁137。

虛發。⁷²在黨人眼中，帝王既本非「天然之產物」，那麼區區誅殺竊據中土的「滿虜」，反倒更係天經地義的事情。

於是，革命派刊物不斷刊載世界各地帝王遭到暗殺或者「昔為殿上主，今作階下囚」的一類消息，以削弱帝制政府的合法性。⁷³不屬無政府主義信徒，且自稱不贊成暗殺手段的胡漢民，⁷⁴日後評論稱：「（無政府主義者）斥強權，尊互助，於各國政府皆無怨詞。對滿州更是恣情毒詈，雜以穢語，使中國從來帝王神聖之思想，遇之如服峻劑去其積滯」，⁷⁵當非虛語。

四、暗殺手段的兩難

無政府主義話語為革命黨人的暗殺手段，附以浪漫的修辭；為革命黨人的反帝制活動，增添了思想上的依據。然而，在有「革命」發生的地區，政治暴力本非罕見之物，不待無政府主義者的嘶喊鼓吹。二十世紀初的埃及，英國統治者和地方貴族常為祕密社會的政治暗殺威脅所擾；義大利改制共和之初，所滋生的暴動、暗殺事件，也可以在法國大革命，或是1920年代的歐洲其他國家找到前例。⁷⁶另一方面，倘若暗殺事件不被敘述成大無畏的革命英雄史詩，就很容易淪為赤裸裸的政治暴力事件。晚清革命派的暗殺活動，很大程度便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號召、以小搏大等策略訴求，常未被凸顯其政治暴力的本質。正如不屬革命陣營的梁啟超，也一度同意，在目下政治參與途徑閉塞不通的中國，「暗殺」尚不失為一種政治參與方法。⁷⁷但實際上，「暗殺」在浪漫化的宣傳背後，仍是一個久處爭議的手段。而這樣的爭議，在革命黨人猶處困頓之際，可能還不至於太明顯，但隨著時間推移，漸

72 无首，〈帝王暗殺之時代〉，《民報》，第21號，1908年6月10日。

73 例見寄生，〈記葡萄牙王被刺〉，《民報》，第19號，1908年2月25日；匪石，〈野獲一席話·法王路易受審之口供〉，《浙江潮》，7，1903年7月20日。

74 黃華，〈胡展堂先生不贊成暗殺〉，《中央日報》，1936年5月19日。

75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頁75。

76 參見Malak Badrawi, *Political Violence in Egypt 1910-1925: Secret Societies, Plots and Assassinations*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Brenda J. Lutz, James M. Lutz,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Republic of Rome: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ume 41, Number 4, (October 2006), p. 491.

77 見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一文。

有不可小覷之勢。

前揭1906年革命黨人葉夏聲〈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謂無政府主義革命以爆裂彈為之，而「政治革命」則屬人民對政府的「公然戰爭」。這說明了即使在革命陣營內部，「暗殺」之採行與否，也不見得能夠獲取共識。其實，對劉師培等抱持無政府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來說，倒清只是中國過渡到無政府社會的手段之一，而無政府革命又比反清革命更優先，故他們不只憂慮清政府能否推翻，同時也擔心革命成功後，中國傳統社會近乎無治的狀態會否被更具統治效力的現代政權所取代？無獨有偶地，章太炎也認為革命應出於個人努力而非組織行動，加以他個人和孫中山的齟齬，復提議廢除同盟會的領袖制，並主張以暗殺來代替武裝革命。簡言之，無政府主義者反對軍備，傾向透過暗殺或促使全民覺悟來推翻清廷。⁷⁸與此相較，在另一部分非無政府派的革命黨人眼中，「暗殺」固然是重要的政治暴力工具，軍備的價值同樣是不容置疑，雙方態度顯有微妙的不同。

1905年，孫中山曾向黨人論稱：暗殺須顧及當時革命情形，與敵我兩者損害孰甚，設若因而阻礙它種運動進行，雖殲敵渠，亦為不值；且敵勢未破，不過將「造惡者」個人之甲乙更替，而以「黨人之良」搏之，代價實不相當。是以，「惟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至不動搖我根本計畫者，乃可行耳。」⁷⁹換言之，孫所在意者乃行使暗殺是否合算，能否配合革命的行動。當然，孫這段談話，也沒有否定「暗殺」之於革命手段的合法性。究其實際，革命黨人此起彼落的暗殺活動，誠然損失慘重，但所形成的恐怖氛圍確不容小覷。1911年，清廣州將軍孚琦遇刺身亡後，繼任接事的鳳山甫抵省城，迎面竟是「總督及布按以下皆不敢出」的蕭冷景象。諷刺的是，鳳山拒絕旁人進言「黨人悍且譎，宜微服先入城」的提議，逕直乘輿入駐，又遭黨人炸死。⁸⁰再如，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向為革命黨人視作公敵，屢遭暗殺，僅以身免。及至武昌革命軍興，廣州局勢未定之際，李準頗思清祚將終，願與革命黨人緩和。最後，導致李準率軍向革命陣營「反正」的事件。胡漢民後來甚至承

78 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31-236。

79 廣東社會科學院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85-586。

80 吳慶坻修、金梁增訂，《辛亥殉難記》，頁219。

認，辛亥年革命黨人能順利取得廣東省的政權，以李準之功為最。⁸¹

然而，革命政府既起，初淺嘗權力果實滋味的革命黨人，一方面同所有政權一樣，勢不能再允准暗殺一類的暴力現象蔓延，但一方面又難迅速擺脫過往的游俠色彩。辛亥革命前後，蔣介石的性情仍舊浮浪，即其一例。蔣一手主導刺殺陶成章，雖自詡出於「革命人格」，仍舊於「法」難容。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陶案發生翌日，乃不得不急電滬軍都督陳其美，略謂：陶奔走革命十餘年，猝遭慘禍，足為民國前途痛悼，要求速究。⁸²旋即，不獨陸軍總長黃興電陳其美嚴緝兇手，浙江都督府、滬軍都督府、浙江共和促進協會等機關團體也都出示懸賞重金。1月21日，光復會於上海為陶成章舉行追悼會，出席者達4,000餘人。1月30日，陶的骨灰運回杭州，追悼會場竟有萬人之眾。⁸³孫中山莊嚴的辭令和萬頭鑽動的悼念人群，顯示陶是影響力不容小覷的革命領袖。不過，這並未使行兇的另一位革命黨人蔣介石稍改初衷，三十餘年後，蔣在日記中寫道：

余之誅陶，乃出於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⁸⁴

孫中山對陶案的真實態度，也許永遠不會重見天日。惟蔣介石自信此舉出於「革命大義」，能夠博取總理的關愛，未始不是反映出相當程度的革命黨政治文化，有待進一步深究。至少，孫本人也未必如自己曾聲稱的，總是「阻同志行（暗殺）」。⁸⁵1915年間，時值袁世凱當國，革命黨人因「二次革命」失利，一片離散破敗，內部重拾暗殺爆裂彈的討論聲，乃又幡然崛起。⁸⁶其中，有中華革命黨山東

8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輯，頁248-249。

82 詳細經過，見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頁6-8。

83 同上。相關報導見《民立報》，1912年1月17日；1912年1月20日；1912年1月22日；1912年1月31日之內容。

84 《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26日。轉引自楊天石，〈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頁99。

85 見前揭1919年7月1日〈王鼎上總理函〉之孫中山批語。

86 其中參與者包括臺灣籍的蔣渭水，蔣氏曾為同盟會臺灣分會會員，後躬身籌劃刺殺袁世凱，事蹟參見《重修臺灣省通志》，第9卷，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6月），頁367；白成枝，〈先烈蔣渭水傳略〉，《蔣渭水全集》，卷首（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年）；王

支部代理部長班林書致函孫中山，略稱：當今中國軍人「滑頭」，大異於第一次革命時代，即能運動，亦難可靠；於今欲行革命計畫，仍宜稍重於暗殺一途。函中接著論道，「以弱敵強，明攻為難，暗襲則易」，而袁世凱護衛森嚴固不易暗殺，但袁麾下「走狗將軍者流」殺之則易。經由此道，不獨於原有革命勢力無損，反能「震起」大江南北豪傑共同討賊，繼而「革命元神自可隨此爆裂之聲活躍於神州大陸」。這一次，孫並未拒絕，批示的全文是：「所言若果誠心，可准其辦理。惟費不得過應用之數」。⁸⁷

蔣介石之刺陶成章，事情多少有些隱晦；反之，晚清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每被謳歌為浪漫化的史詩；而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政權搏鬥的經過，也常被敘述成堅苦卓絕的故事。諸案相提並論，或許容易啟人疑竇，亦難容於傳統革命史觀的提法。就此而言，並不能否認其「性質」有所差異。然而，事件如何被敘述、記憶、放置，本來就牽涉複雜的知識建構過程。當後人爭論刺客的行事動機時，很可能忽略對暗殺作為政治暴力現象的焦慮，也已逐漸在中國公眾輿論內醞釀，不論動機是否「出於革命」。此處可舉一例，在革命黨人眼中，「革命者」遭「反革命者」刺殺的最重要事例，莫過於1913年3月20日爆發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案。案發後，梁啟超乃一改過去「欽佩」暗殺的態度，撰文〈暗殺之罪惡〉，以寄悲憤，不獨悼宋，更為國家前途哀。⁸⁸梁氏認為，不論暗殺的對象是「惡人」抑或「名士」，動機係「沽名」抑或「雪恨」，目的是為「公憤」抑或「私仇」，手段是採取「躬親」抑或「賄喉」，都不容於法律、社會公理，或是社會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梁正是將晚清暗殺潮與宋案相提並論之人，謂對於革命刺客，昔日國人莫

曉波，〈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前揭書代編序。至於相關暗殺行動的討論，可參見環龍路檔案中，1915年前後為數不少的相關函件。如〈余漢致總務部函〉，1915年11月28日，黨史館藏：環00402，謂擬在京津暗殺「袁黨重要人物」，惟母老家貧，幼弟幼子尚不能自立，請求接濟。

87 〈班林書上總理書〉，1915年9月7日，黨史館藏：環03444。

88 參見梁啟超，〈暗殺之罪惡〉，《飲冰室文集》，第31輯，頁5-8。梁氏對晚清暗殺風潮的評論是：「我國當清之際，暗殺案屢起，吳樾之於五大臣、徐錫麟之於恩銘、汪兆銘之於載灃、熊成基之於載洵、某某之於孚琦鳳山，國人莫不敬其志。然謂非有此而清命不能革，識者有以知其不然也。五大臣、載灃、載洵皆不成於殺，恩銘、孚琦、鳳山則蟻螻耳，不足為輕重，且皆置勿論；其最有價值者，宜莫如良弼之役，然平心論之，當時雖不去一良弼，其力亦豈足以為共和梗？以共和之成，歸功於良弼之死，非論世之公言矣！」

不敬其志，惟「謂非有此而清命不能革，識者有以知其不然」，也不能遮掩「暗殺為天下莫大之罪惡，且為最可羞之罪惡」的事實。

梁啟超認為，導此暗殺惡風，乃因「近世偏頗之輿論」所致。頗耐人尋味的是，清季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上，也常出現介紹「暗殺」的文章。這似乎顯示，梁本人有意無意間也曾屬「偏頗輿論」的推波助瀾者。惟梁氏態度的轉變，未嘗不是反映他對中國常規性政治參與模式的追求，對政治脫序與政治暴力現象的焦慮。不惟如是，在中文世界裡，較早系統地分析清末民初暗殺事件的專文，首推1934年白蕉⁸⁹發表的〈民國初年有關大局之三大件暗殺案〉。白文依序討論吳祿貞、良弼、宋教仁三人之案。他認為，袁政權之暗殺宋教仁、陳其美，乃出於「恣欲自快」、「設財役貪」，最終不免「為暴自斃」。國民黨則「為全民，為主義，不得已才採此手段」。即使如此，白蕉仍不得不點明：中國在「封建軍閥時代」暗殺事件頻仍，社會上頗有認它為「不幸不良現象」的趨向，且在一個「法治的文明國家」，此風絕對不可長。⁹⁰

白蕉沒有說明的是，即使是國民黨自身，在宋案後仍長期受政治暗殺事件纏身。1922年的鄧鏗⁹¹遇刺案，迄今真相難明；⁹²1925年8月的廖仲愷遇刺案，則顯然是出於黨內路線的爭議了。廖仲愷是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左派勢力的象徵，在黨內一系列意識型態爭奪、權力競逐事件中遇刺身亡。「右派」領袖胡漢民更因受本案

89 白蕉（1907-1969），本名何治法，字旭如，又字復生，後廢姓不用。上海金山縣人。名書法家，曾進黃炎培所辦「人文社」，後人文社擴大為人文圖書館，一度主編《人文月刊》，著有《中華民國與袁世凱》、《珍妃之悲劇》等書。

90 參見白蕉，〈民國初年有關大局之三大件暗殺案〉，《人文月刊》，第5卷第10期（1934年12月15日）。

91 鄧鏗（1886-1922），字仲元，廣東惠陽人，是孫中山早期重要軍事助手之一。任粵軍第一師師長期間，選調了陳可鈺、李濟琛、鄧演達、張發奎、陳銘樞、蔡廷鍇、薛岳、蔣光鼎、陳濟棠、余漢謀等人，分任第一師團長、參謀長、營、連長等職務。許多人成為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幹部。參見呂芳上，〈鄧鏗〉，《中華民國名人傳》，第7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頁386。

92 國共兩黨皆謂出自陳炯明之手，但汪榮祖稱是國民黨策劃。參見氏著，〈鄧鏗之死真相探索〉，載於李敖等著，《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02：擁戴·擁戴·醜》（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年）。其實，汪文所引英美領事報告謂“Teng Keng was instigated by the Kuo Min Tang”，可能僅出於街談巷議之口，未足以斷定刺殺鄧鏗的兇手。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來，習以暗殺手段解決政爭，也確成了外界對國民黨的觀感。

牽連之故，被迫「出國考察」，形同流放。案發之際，共產黨人周恩來主事下的（國民黨）黨軍政治部，旋即發布文告，謂此事出於「忍心害理、卑鄙惡濁、下流無恥」的「暗殺黨」之手，復強調國民政府惟有肅清暗殺黨，方能稱為「名符其實之國民政府」。⁹³國民黨此時尚僅割據廣東一隅，但已日漸感受到「暗殺」對統治秩序的威脅性。不過，國民黨本質上仍是正在逐鹿政權的「革命黨」，對寄身其間的周恩來等人而言，就暗殺問題的思考，未嘗沒有意識型態上的根據。

作為革命陣營中後起的左翼力量，周恩來等人對「革命」的思考，難免與晚清前輩有所不同。無政府主義話語曾是晚清黨人浪漫化暗殺行動的靈感泉源，其影響力在二十世紀初一度高於其他流派的社會主義。周及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服膺共產主義前，都接受過無政府主義的洗禮。惟在「五四」前後，大概是受俄國革命成功的影響，共產主義乃占上風。從1920年代起，曾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陳獨秀、周恩來等人，反過頭來撻伐無政府主義了。⁹⁴大抵而言，共產主義者主張「煽動」群眾運動，在意識型態上反對使用暗殺手段，是其政治對手也承認之事。⁹⁵而無政府主義思潮雖仍以其他方式繼續影響中國的知識界，⁹⁶但在現實政治上的最大啟發，亦即暗殺，僅見1924年的黃素英謀刺新加坡總督案。⁹⁷在此同時，居「革命元老」身分，與現實政治較密切的知名無政府主義者，諸如張繼、李石曾、吳稚暉等人，頗多在國民黨組建新政權的進程中，扮演份量不輕的角色，甚至被劃歸「右翼」光譜，也不宜再公開倡行暗殺手段。在新的政治文化氛圍中，革命話語更趨於強調「喚醒群眾」、「走入民間」和新的集體主義。暗殺事件雖未絕跡，但晚清個人英

93 仲愷先生紀念籌備委員會編，《廖仲愷先生哀思錄》，收入於《廖仲愷先生殉難資料及哀思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頁21。

94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36-23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76-80。

95 屈鏡，〈實行暗殺主義〉，《中央日報》，1929年7月22日。

96 如Arif Dirlik認為，無政府主義在廣義的中國革命上影響廣泛，即如「勞工神聖」理念亦出於此。參閱氏著，《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6月），頁367。

97 洪德先，〈民國初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1912-193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頁186-193。

雄主義式的刺客，似乎已和時局顯得扞格不入了。

然而，革命黨人習用的「運動軍隊、聯絡會黨、用手槍炸彈對付」三法，乃長期政治現實所鑄成。暗殺之術既非外來事物的生硬移植，當然也不會因為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式微就銷聲匿跡。就此而言，梁啟超基於「社會利益」對晚清以降暗殺潮作的批判，革命黨人同樣感到搔不到癢處。畢竟一個對和平獲取政權漸感絕望的政治團體，更在意者將是運用政治暴力的策略問題。及至1920年代，國民黨進行的「改組」，以及籌建黃埔黨軍，都顯示他們試圖在「三法」外別立蹊徑。1924年5月，蔣介石在黨軍的搖籃，亦即黃埔軍校，勉勵學生「為主義而死」，惟「不一定要學暗殺的行動」。⁹⁸1925年3月20日，亦即孫中山溘然長逝後的第八天，國民黨機關刊物廣州《民國日報》刊載了一篇社論，題曰「以後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黨員？」其中略稱：昔日革命初起，除採「暗殺」、「兵變」手段外，別無善法。及至革命陣營日趨壯大，「舊法子」已漸失效用，因為「以後與其說要拿手槍和炸彈的人，無寧說肯去研究講術的人」。⁹⁹

國民黨人聲言暗殺是「舊法子」，並不意味着和梁啟超就政治暴力的看法已趨於一致。¹⁰⁰相較於晚清前輩，此時黨人已進一步追求翻轉社會結構，使「造惡者」永無再起之人。¹⁰¹因此，「宣傳」的重要性屢被提起，¹⁰²不意味着政治暴力將趨於和緩。究其實際，所謂「宣傳」，不見得是繪畫繡花、請客吃飯式的宣傳。¹⁰³

98 見〈仁民愛物為軍人之要道（1924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15。

99 曙風，〈社論：以後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黨員？〉，《民國日報》，廣州，1925年3月20日。

100 事實上，北伐期間，梁啟超直言南方的「革命」新政權，帶來了新的「赤色恐怖」。而即便蔣介石、唐生智等軍事實力派和共黨分道揚鑣，也無從改變這一趨向。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頁190-195。

101 最典型的論述，莫過於孫中山於1924年9月發表的「北伐宣言」，略謂：「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參見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卷（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69-171。

102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8輯，頁1053-1054；1087-1100。

103 「宣傳」與暴力的關係，毛澤東在其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已有耐人尋味的說明。毛謂北伐初期，湖南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個個已受政治宣傳的薰陶。但這是在共產黨、農民協會陶冶下，透過監禁、驅逐、甚至是槍斃「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後，才能辦到。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2-44。

國民黨人白瑜不諱言地說，它意指「總理死後，再要想到中國革命成功」，只有靠「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的辦法，並進行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恐怖」手段。¹⁰⁴從後續歷史發展看，白氏此語，並非全出於虛言。1926年7月，在國共合作格局下，國民黨北伐大進軍號角聲吹響。就在湖南鄉村，共產黨人主導的「農民運動」，造成名士葉德輝被弑，全國輿論大譁；¹⁰⁵各類錯殺、濫殺情形，或其他政治暴力氛圍，不可小覷。¹⁰⁶而1927年4月，國民黨一改聯俄容共初衷，發動「清黨」，坐令流血殺戮，更令時人有「矛盾」之感，¹⁰⁷深覺「南方新派殺起人來，不比舊派的北洋軍閥差」。¹⁰⁸從政治暴力的角度看，揚棄「舊法子」，似乎是因為革命黨人想像的新敵人更多、更大。

正因為國共黨人之聲言放棄暗殺，主要是基於政治暴力的運用策略。是以萌發於晚清的「暗殺時代」，並未隨著革命「新法子」出現，抑或國民黨人在1928年取得政權，就告退出歷史舞臺。兩黨分途發展後，中共在特定情況下似乎猶採暗殺手段，¹⁰⁹而國民黨更長期與政治暗殺事件牽扯不清。對南京政權而言，特務機構日趨傾向於採用團體訓練單位、嚴密組織管理、極端祕密之行動，而非具有浪漫色彩的晚清個人英雄模式。¹¹⁰畢竟身為執政黨，涉足暗殺只會損害信譽。但不容忽視的是，前述情景仍舊不會妨礙刺客之自詡「出於革命」。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北平站長的陳恭澍，¹¹¹針對1930年至1940年代間的國民

104 白瑜，〈留別有槍的同志們〉，《革命軍》，9（1926年1月），頁18。

105 〈如狂如醉之長沙人民〉，《大公報》，天津，1927年5月1日；〈大恐怖之長沙〉，《大公報》，天津，1927年4月27日。

106 參見張世瑛，〈罪與罰—北伐時期湖南地區懲治土豪劣紳中的暴力儀式〉，《國史館學術集刊》第9期（2006年9月），頁49-101。

107 〈社評：革命之矛盾〉，《大公報》，天津，1927年6月30日。

108 參見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43-244。

109 見李久義，〈顧順章與「紅隊」〉，《中共研究》，20：1（1986年11月），頁127-134。事實上，在國民黨檔案、報刊上，常可見到共黨暗殺活動的「情報」。其真實性如何，有待學者在未來一一查考。

110 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E.)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祕勤組織》，頁373。

111 陳恭澍（(1907-?)），河北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國民黨重要特務人員，參與刺殺張敬堯、吉鴻昌、汪精衛等行動，中日戰爭期間一度投降汪精衛政權。1945年以漢奸罪名被捕，後獲釋。1949年後到臺灣，官至國防部情報局第二處少將處長。

黨特務工作，分析說：刺客在殺人換取獎金，俾資膏火之餘，猶感社會貧富不均，以「革命團體」自負。¹¹²這類問題，非但與國家機器的運作性質攸關，更和近代中國「革命」的政治文化糾扯，宜待他日繼續探討。

五、結 論

1930年代，白蕉在〈民國初年有關大局之三大件暗殺案〉文中，論析政治暗殺之所以被採擇，理由或為「正面力量不夠」、「惟機密可以達到目的」、「內幕本來不足為外人道」、「希望僥倖避免法律之制裁」、「避免最大的犧牲」，¹¹³此說不為無見。¹¹⁴這也指陳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暗殺事件頻仍，主因乃常規性政治參與模式遲未確立，造成政治暴力現象的揮之不去。我以為後者遠比宣傳文本上強調的「革命」與「復仇」主題，更具關鍵性的地位。

就某種意義言，不論是「民主」的美國，抑或「集權」的蘇聯，「法西斯」的德國、義大利，均有制度化的特務機構，也都多少涉足暗殺事件，關鍵在於國家機器如何掌控運用。不惟如是，即使在民主國家，猶不乏個人或組織的政治暗殺事例，足見政治與暗殺暴力的共生情形。相關問題層面廣，犬牙交錯，並非本文所能梳理。惟就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言，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晚清的個人英雄主義式暴力，如何轉化成集體主義式的黨國機器呢？而這樣的歷史進程，又往往被冠以「革命」之名，倘無寬廣的研究視野，此等問題並不易解答。

事實上，大多數革命運動都會採取暴力，試圖制裁政治敵人，中國也不例外。

112 陳恭澍，〈黨國元老唐紹儀之死〉，《藍衣社內幕》（上海：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1943年），頁30-31。其他資料亦可說明特務以「革命」自任的情形，見劉非，〈軍統的特務訓練〉，文聞編，《我所知道的軍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頁200；沈醉，〈蔣介石陰謀暗殺李宗仁的內幕〉，文聞編，《我所知道的政治暗殺祕聞》，頁177。

113 白蕉，〈民國初年有關大局之三大件暗殺案〉，頁1-2。

114 前揭之1915年〈班林書上總理書〉適可印證，略謂：「若欲運動軍隊使之助我討賊，固可以一戰，然而近世軍人勢力滑頭大異於第一次革命時代。即有可靠者，亦不過十之八九屬騎牆之派。至於可用與否，尚在未定之間耳。雖然起義與運動軍隊二者，皆可以作，惟是非乘時機便無用矣。本黨現在進行計畫，宜稍重於暗殺一途。夫以弱敵強，明攻為難，暗襲則易。唐詩有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諺曰：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為今之計，既不得袁賊而戮之，當先殺其爪牙，取射人先射馬之計。」

在社會開始省思「告別革命」前，藉「革命」之名行使暴力，可謂常態。軍隊是當中最引人矚目的暴力工具，¹¹⁵至若同樣常見，但顯得不那麼「正規」的暗殺手段，學界討論較少。中國革命黨人採取暗殺行為，以1900年史堅如之謀炸粵督德壽首開先例。它作為一種利用近代科技的暴力手段，要早於數年之後方才降臨中國的世界革命術語。史對「政治暗殺」一詞，並無清晰的概念；同時，「政治暗殺」的討論，也還沒有進入公共領域。即便如此，這一行動仍舊預示了二十世紀中國層出不窮的政治暗殺事件。

史堅如身後，無政府主義話語才開始為革命黨人的暗殺行動，增添了浪漫化的修辭。晚清革命派刊物充斥著借用無政府主義話語，鼓動暗殺滿清親貴的宣傳文字，許多革命黨人以為，這不失作為一條推助反滿民族革命的途徑。然而，採行暗殺的「策略」，和宣傳文本上的辭藻，不盡可混為一談。民國肇造以後，黨人持續投身暗殺行動，卻不再標榜無政府主義。這顯示了除去親躬暗殺行動的劉師復等無政府主義者外，大多數的革命黨人對相關語彙的採擇，僅是一種挪用。「虛無黨加游俠刺客」，是本文對他們的斷語。

正因為如此，暗殺行動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現象，革命黨人不獨刺「反革命」敵人，也有可能弑去同屬革命派的政敵，陶成章案即一例。這樣看似弔詭，且和宣傳文本所述極不協調的現象，其實是革命內部武裝暴力和符號暴力多樣面貌的縮影。它還牽涉到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暗殺作為「歷史事件」，如何被置放？如何被記憶？如何被書寫？對信守革命史觀的人而言，傾向不視宋教仁案一類事件是晚清暗殺風潮的續曲；但在非屬革命派人物的梁啟超看來，宋案根本是晚清暗殺潮的餘音。梁謂宋案的發生，足為國家前途憂；但他也檢討昔日國人敬佩的刺客烈士，所作所為其實損害了社會利益。換言之，梁氏著意處並非暗殺動機是否「出於革命」，而在於他對政治暴力現象的焦慮。

若中國國體既為共和，政體既為立憲，何來「豔稱（暗殺）為壯烈之舉？」¹¹⁶

115 清末新軍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重要研究成果可見馮兆基（Edmund S. K. Fung）著、郭太風譯，《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至於國共兩黨「革命」運用軍隊的模式，學界雖已留心，但仍屬可資開拓的課題。

116 梁啟超，〈暗殺之罪惡〉，頁8。

是梁啟超對政治暗殺事件的最大質疑。但對革命黨派來說，1920年代以降，國共兩黨的正統革命理論，也已漸將暗殺視為「舊法子」，聲稱將改由「喚醒民眾」入手，不再以誅殺一、二「造惡者」為度。惟經由此道，其實亦反映了黨人所想像的「反革命」敵人，從一、二親貴，瞬即膨脹成為數難計的「官僚、土豪、劣紳」，殺之不勝殺。正因梁氏溘然長逝後的數十年來，中國的「共和」實質上仍近於泡影，各式各樣的政治暴力現象就只能變本加厲，何況國共兩黨並沒有澈底放棄暗殺手段。

綜合觀之，探討中國這段「暗殺時代」，至少有兩個層面。就政治暴力現象言，政治暗殺萌發於晚清，迄南京國民黨政權傾覆前夕而未絕。惟若就「革命話語」論，革命黨人執行暗殺、倡說暗殺、討論暗殺，在1920年代左右乃因革命理論的改變，方在口頭上將之揚棄。但不論就何者言，皆有一段不可小覷的歷史脈絡，它既與政治脫序攸關，也曲折地反映中國社會對政治的想像。過去學界的討論框架，顯有不足；而本文所論析者，亦偏一隅，猶待更細緻的考察。

無論如何，對革命施以過分浪漫化的詮釋，抑或貶低它為盲目的破壞，都是可資商榷的取徑。晚清革命黨人欲以個人英雄主義，一振禹域精神；以及1920年代的國共黨人，嚮往建立新的社會，都有其現實的理由。從某個視角談，革命無疑需要暴力，難免流血，「暗殺」僅僅是眾多手段之一。而捲入各式暴力漩渦者，固然有生性鐵石心腸之輩，但也不乏後天受涓涓細流礫塑者。若借用十數年後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¹¹⁷就刑前的傷感筆調，這也許是「懦怯」且「婆婆媽媽」的書生，變成「殺人放火」的革命者之過程。¹¹⁸種種看似矛盾的片段，顯示了政治運動操弄暴力時的複雜。（責任編輯：薛月順）

117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出身敗落士紳之家，遂入免費的外交部俄文專修館就學。1920年，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通訊員身分，赴莫斯科採訪，陸續發表遊記，後輯為《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起，數度主持中共中央。1935年2月，在福建被捕，同年6月被槍決。

118 語出瞿秋白〈多餘的話〉，1935年寫於獄中，最早露布於1937年第25期至27期的《逸經》雜誌中。本文寫作參考版本為《中國百年傳記經典》，第2卷（上海：東方出版社，1999年），頁107-137。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環龍路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環00402，〈余漢致總務部函〉，1915年11月28日。

環03444，〈班林書上總理書〉，1915年9月7日。

環03445，〈班林書致謝持函〉，1915年9月11日。

環09285，〈王鼎上總理函〉，1919年7月1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3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年。

（二）年鑑、辭典

秦孝儀、李雲漢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郭廷以編，《近現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平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組編，《軍統在福建》。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11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

文聞編，《我所知道的政治暗殺祕聞》。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

文聞編，《我所知道的軍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

未著撰人，《溫生才行刺始末記》。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

仲愷先生紀念籌備委員會編，《廖仲愷先生哀思錄》，收入於《廖仲愷先生殉難資料及哀思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吳慶坻修，金梁增訂，《辛亥殉難記》。臺北：成文書局，1970年影印本。

吳樾，《暗殺時代》，收入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1971年-1974年。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

陳恭澍，《藍衣社內幕》。上海：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1943年。

楊守仁，《新湖南》，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

鄒容，《革命軍》，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

廣東社會科學院等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年。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出版社，1959年。

瞿秋白，《多餘的話》，收入於《中國百年傳記經典》，第2卷。上海：東方出版社，1999年。

（四）期刊、報紙

《人文月刊》，1934年。

《大公報》，天津，1913年、1927年。

《中央日報》，1928年至1937年。

《民立報》，1912年。

《民報》，1906年至1908年。

《革命軍》，1926年。

《浙江潮》，1903年至1904年。

《晨報》，1928年。

《民國日報》，廣州，1925年。

《警鐘日報》，1904年。

（五）專書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

李守孔編著，《國民革命史》。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年。

李敖等著，《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02：擁戴·擁戴·醜》。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年。

李寶嘉，《文明小史》。臺北：世界書局，1981年。

張其昀，《黨史概要（近六十年中國革命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修訂版。

陸保璿輯，《滿清稗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

馮兆基（Edmund S. K. Fung）著、郭太風譯，《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臺北：世界書局，1954年。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鄒魯，《紅花岡四烈士傳》。臺北：陳雄印行，1959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編，《重修臺灣省通志》，第9卷，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E.）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祕勤組織》（*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

（六）論文

牛貫傑，〈試論清末革命黨人政治暗殺活動的文化根源〉，《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卷4期（2002年）。

白純，〈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活動探析〉，《學海》（2001年3月）。

余杰，〈不澈底的「虛無」—從晚清小說「女偵探」談起〉，《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4期（上）。

吳潤凱，〈復仇與革命—清末「暗殺潮」透析〉，《二十一世紀》，總第98期（2006年12月）。

李日，〈楊毓麟與近代暗殺活動〉，《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1期第5卷（2002年）。

洪德先，〈民國初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1912-193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張全之，〈從虛無黨小說的譯介與創作看無政府主義對晚清小說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3期。

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

黃佳，〈無政府主義的傳入與辛亥革命時期的暗殺風潮〉，《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14卷第2期（2002年6月）。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第11卷第1期（2000年）。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6月）。

賈忠勻，〈北京暗殺團刺袁紀實〉，《文史天地》，1996年第3期。

劉熙明，〈看不見的血手：國共內戰時期的國府特務人員殺人與蔣介石之關係〉，《臺灣史學雜誌》，第6期（2009年9月）。

歐陽恩良，〈辛亥暗殺風雲的思想社會根源〉，《青海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歐陽恩良，〈資產階級各派別與辛亥前夕的暗殺思潮〉，《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6期（2001年）。

嚴昌洪，〈辛亥革命的暗殺活動及評價〉，湖北歷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六）英文部分

1. 專書

Badrawi, Malak, *Political Violence in Egypt 1910-1925: Secret Societies, Plots and Assassinations*,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Chan, Henry Y. S., *Terrorism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00-1911*, Ph.D.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Lean, Eugenia,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Zelizer, Barbie,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論文

- Back, Kurt W. & Saravay, Judith, "From Bright Ideas to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1:2, 1967.
- Edelman, Murray & Simon, Rita James,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s: Their Meaning and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Ethics*, 79:3, Apr., 1969.
- Jensen, Richard Bach, "Daggers, Rifles and Dynamite: Anarchist Terror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6:1, Spring 2004.
- Kourvetaris, G. A. & Dobratz, B. A., "Political Power and 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8, August 1982.
- Lutz, Brenda J. & Lutz, James M.,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Republic of Rome: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1:4, October 2006.